

探 索 篇

刘宗华

一、成长为一名合格教师

（一）走上讲台

我在教育岗位工作 40 多年了。从一个高中毕业生到成长为中学特级教师，走过了漫长的路。我是怎样走上教师岗位的呢？

1952 年，我在北师大附中高中毕业。那时，刚解放不久，百废待兴，百业待举，各方面都需要人才。人民政府接管了学校，大量城市劳动人民的子女需要上学，中小学教育有很大的发展。但是，教师奇缺成为燃眉之急。党和政府在 1952 年、1953 年动员大批高中毕业生留校从事教育工作。我就是在这种形势下，响应号召留校工作的。

我之所以响应号召从事教育工作，也有我个人内在的原因。我出生于河北农村，母亲在家务农，父亲在北京当学徒。1938 年，父亲出师后，我随母亲来到北京。那时，北京已被日本帝国主义侵占，谋生很难，老百姓生活困苦。孩子上小学要学日语，受日本教官管束，精神受到很大压抑。好容易盼到日本投降，谁知“想中央，盼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在国民党的统治下，物价飞涨，民不聊生，我家陷入贫困的深渊。

父亲带着多病之身到廊房打工，母亲夜以继日靠缝针线度日，我也染上肺病，不能正常上学。在困苦的挣扎中迎来了北平的解放。记得 1949 年初，我正在师大附中上初三，我和全班同学到前门大街五牌楼西侧欢迎解放军入城，那种发自内心的欢乐真是难以言表，一种“解放之感”油然而生。

解放后，国家给我助学金帮助我完成了初中学业，并被保送入师大附中高中学习。1950 年 2 月，我加入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参加了“共产主义人生观学习班”，开始懂得了为人民服务，树立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那时，北京家庭贫困的失学儿童很多，北京市教育局翁独健局长号召举办儿童夜校，以解燃眉之急。师大附中也办起了夜校，我们不少高中同学来到夜校义务教书。我到夜校后不久，被选为校长，每天下午课后到夜校工作，直到八九点钟才回家。夜校很不正规，同一个班里学生年龄、成绩相差很大，年龄稍大一点的有的还当学徒，白天在作坊劳动，晚上来学习。他们知道努力用功，和老师的关系很好。经过一年多的文化补习，我教的学生有的考入师大女附中，有的考入潞河中学，有的则上了通县师范。翁独健局长发给我们“义务教员光荣”的小红本，以资奖励。

夜校工作十分劳累，1951 年 10 月，报名参加军事干部学校体检时，发现肺病严重，只得暂时休学。但这一段教学生涯使我终生难忘，我爱上了这一工作，爱上了这些渴望学习成长的儿童，也促使我留校从事教育工作。1953 年，经我的历史老师洪源先生的介绍，我从师大附中来到北京一中任历史教师。从此，我和历史教学结下了不解之缘。

（二）初入一中

北京一中是一所历史悠久的老学校，原为清朝培养八旗子弟的书院，辛亥革命后改称北京一中。学校有宽大的图书馆，藏书丰富，有一部康熙年间铜活字印刷的一万卷的《古今图书集成》，十分珍贵。校长是位进步的爱国民主人士、民主促进会北京市委的负责人徐楚波，后来成为全国政协常委。师资力量较强，有些全市知名教师。历史教研室有十来位教师，有老教师高博彦，1956年定为一级教师，有解放初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的谢承仁，还有北京师大和东北师大毕业的一些老师。我被分配在初中一年级，教4个班历史课，担任班主任，还兼任教职工团支部书记。

我没有学过历史专业，更没有学过教育理论，教课的困难可想而知。我高中学的历史课是范文澜主编的《中国通史简编》的缩编本，讲课就以这本书为参考，还有吕振羽的《简明中国通史》。每天备课到深夜，讲课虽背得熟练，但内容多而杂，不能突出重点。有一次，谢承仁等老师听我讲课，讲的是春秋五霸。我按照范老书中的第一编第四章第二节“王室衰微与大国争霸”的内容，把“周太王长子太伯、次子仲雍让继承权给季历，逃奔到梅里（今无锡），作了蛮人君长，国号吴”，“熊绎受到周天子的封爵，居丹阳，子孙不断扩大土地，国号楚”，“晋国助吴攻楚，楚国助越攻吴”等内容都讲出来。结果，由于内容头绪多，心情又紧张，课没有讲完，也讲得很乱。

这次听课给我的帮助很大，使我懂得了教学艺术，讲课要突出重点，层次分明，要围绕教学目的分清主次，组织教材。

但是，由于我是第一遍教中国古代史，没有参照和比较，很难确定我定的目的和重点是否合适。正在困惑之时，北京市教育局给我们任课教师发下来油印的教学参考资料。这份资料是北京市教育局组织有经验的教师利用 1954 年暑假编写出来的。1953 年前后，由于中小学的急速发展，学校、班次、教师急剧增加，严重影响了教学质量。中共北京市委及时作出了《关于提高北京市中小学教育质量的决定》，通称“五四决定”。组织有经验的教师编写教学参考资料，就是决定采取的措施之一。这套资料按照课本编章节的顺序，每节分教学目的、重点难点、教材分析、教法建议、注释和资料等项内容，把老教师的基本教学经验介绍给新任教的教师。按照这套资料进行教学就可以保证基本的教学质量。这套资料对我来说是及时雨，备课有了参照物，心中有了底。从此，我的教学再不像脱缰的野马，而是有章法，有规矩，比较规范了。

那时，由于教学班次多，教学秩序较乱，我的班主任工作也遇到麻烦。一次上数学课，年近花甲的宋老师怎么说学生都不听，课上不下去，气得教师给学生下跪。这事引起轩然大波，学校领导非要处分几个带头闹的学生不可。我虽缺乏教育经验，但有一颗热爱学生的心，经常深入学生中，了解他们的想法。我向学校领导说明，学生没有恶意，就是管不住自己。宋老师年纪大，讲课慢，怕学生不会，又讲得很繁琐。学生自认为都会了，就乱说话，不听讲。如果处分几个学生，恐怕后果不好。学校采纳了我的建议，让我加强教育。我抓住这件事，开了几次班会，学英雄，找差距，进行遵守纪律的教育，同时加强管理，克服我的“对学生热爱有余，严格要求不足”的缺点，班上的纪律面貌有了较大改观。40 多年后，已是北

京教育学院地理系主任的当年的学生，和我谈起这件事仍心有余悸，说：“当年，多亏您的理智大度，要不然我一定受严重处分，这会严重影响我的健康成长。”

那时，一中青年教师较多，仅 1953 年响应号召留校工作的就有二十来人。他们大都考上了高等学校，保留两年学籍，去留问题一直萦绕在心头。我作为教工团支部书记，针对这个问题作了许多工作，也很见成效。由于教育教学工作的进步和各方面的锻炼成长，1954 年 10 月我被批准为光荣的共产党员。1955 年暑假，全市中小学集中进行肃反工作，我被调到市调研组，在领导小组直接领导下工作。此时，长期患病的父亲在家乡去世，因工作离不开，我没有请假回家奔丧。

（三）勇挑重担

1956 年暑假后，高中三年级开设胡华主编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一中高三有五个教学班，学校安排我和谢承仁老师分担，谢老师教两个班，我教三个班。这对我来说是千斤重担。我想学校把这么重的任务交给我，是经过慎重考虑的。这门课虽说是历史，但讲的是中共党史，政治性很强，最好是由党员承担。历史教研组就我们两个党员。我不好说不承担。再者，谢老师是北大历史系毕业的有名的教师，安排我们教相同的课，是有意让我向谢老师学习，让谢老师把关，带着我。我不能放过这个难得的机会。经过反复思考，我接受了任务。

接受任务后实施起来困难还是很大的。首先是高三学生心理上不服。我是高中留校生，年龄比他们大不了几岁，远不如谢老师在他们心目中的地位。上课时心理紧张，每次提问，检

查作业或小测验，要求严了，学生不会，产生反感；要求不严，又怕影响质量和效果，这种心理障碍是第一个拦路虎。其次是教材内容偏深偏难，备课较困难。课本中引用不少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论述，对于这些由于我不曾读过原著，理解起来难免断章取义，不能深刻领会。第三是我的负担太重，不能集中精力和时间备课。这一年除高三课外，我还担任高三（1）班班主任、党支部宣传委员、工会主席和历史教研组长。头绪太多，穷于应付。北京师范大学这一年办起了函授部，我和其他高中留校生，响应国家“向科学进军”的号召，都上了函授大学。我读的历史系，由杨钊、李雅书老师给我们讲授中国和世界的古代史，赵光贤、何兹全教授给我们开专题讲座。

在这种高负荷的压力下，运转了一段时间，终于发生了问题。那是在高三（2）班上课，讲的是第一章第四节“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发展”，课本引用了毛泽东《反对党八股》中的一段话，说明文化统一战线的分化。下课后，一位学生拿着课本问我：“老师，什么叫形式主义向右的发展？什么又是形式主义向‘左’的发展呢？”学生很认真，学习肯动脑子，提出的问题很有水平。但是我却卡了壳。我没有读过《反对党八股》，又对“五四”运动后文化思想界的分化与斗争的具体史实缺乏了解，无法回答学生的问题，只好说等我查查再回答你。这件事对我刺激很大，再不能这样应付下去，必须集中时间和精力把课讲好。否则连左右都分不清，岂不误人子弟。我向学校领导反映了情况，辞去了高三（1）班班主任，工会主席也成了挂名，由别人负实责。我把师大函授的课程也放一放，集中精力系统钻研《毛泽东选集》前三卷（当时第四卷尚未出版），并系统听谢承仁老师的每一节课，经过刻苦努力，讲课站住了

脚，受到学生的好评。配合《毛泽东选集》的学习，我还阅读了人民出版社和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共党史参考资料。这种学习和我热爱党、热爱党史的感情结合在一起，产生了无穷的力量。真是如饥似渴，废寝忘食，读到兴奋处，全身发抖，不能自控，好像每根神经都在抖动。经过这段学习，我不但提高了理论水平和分析问题的能力，也养成了钻研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兴趣和爱好，为今后的理论学习和历史专业知识学习打下了比较坚实的基础。师生反映理论分析见长，史论结合是我讲课的特点和优点之一。

（四）编写教材

1958年是不平常的一年。这年5月召开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提出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工业、农业、文化教育战线出现了万马奔腾的跃进局面。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对教育工作的指示，提出“教育要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提出要“缩短学制，改革教材”，着重进行“阶级观点、群众观点、劳动观点和辩证唯物主义观点的教育”。历史学科领域则提出“打破王朝体系”“厚今薄古”“古为今用”的原则。在这种形势下，各地纷纷进行教育革命实验，缩短学制，改编教材。北京市东城区教育局要进行中小学十年一贯制实验，抽调各科部分教师编写教材。我和五中王克骏、二十二中王子和、女十二中刘占文等人负责编写历史教材；我负责中国史、刘占文负责世界史。北京市教师进修学院的赵恒烈老师，也来参加指导我们的编写工作。在当时那种革命跃进的形势下编写教材，必然受到“左”的影响。所谓编写主要是在人民教

育出版社课本的基础上删删改改，去掉一些次要朝代的兴亡更替，减少一些统治阶级内部的斗争；突出社会发展规律的内容和农民战争的历史作用；增加文化成果方面的内容，突出爱国主义思想教育等。只用了几个月的时间就编完了初稿。我们的编写体会发表在 1959 年 1 月号《历史教学》上。

1959 年 3 月，北京市教育局中小学教材编审处要编写当年暑假后使用的小学和初中的历史课本，时间紧，任务急，抽调我和五十六中的吴雁南、一百五十九中的朱仲玉以及赵恒烈组成编写组。这次编写比较正规，有胡朝芝处长的具体领导，有北京市主要领导同志的审查把关。中国古代史由吴晗副市长审查，中国近现代史由市委书记邓拓审查。吴副市长对中小学历史课本的编写非常关注，曾几次就编写的指导思想和编写体例和我们座谈。他认为历史教育不可能一次完成，不怕必要的重复，要分出层次性。小学要讲英雄人物的历史故事，要写得丰满生动，故事性强，不必强调历史知识的系统性和完整性；写出来的人物、事件，前后大体上串起来，像糖葫芦。这种方法也可叫“红线穿珠”。初中就可以按照历史发展的线索和规律，写得比较完整和系统。高中就可以在此基础上加深提高，重点进行一些理论分析和唯物史观的教育。我们根据领导的指示，分工负责，集体讨论，不但注重科学性和思想性，同时注意可读性和文字的规范。初稿完成后听取中小学教师和有关专家的意见，反复修改后再送审。这套教材满足了教学的急需，得到领导和师生的好评。

1960 年暑假，全国文科教材会议在北京西苑饭店举行。当时，我正在北京市委党校编写教材，胡朝芝处长带着我和赵恒烈列席了会议。会议由教育部长杨秀峰主持，中宣部副部长

张盘石到会作报告。与会者就文科教材改革、“打破王朝体系”、“厚今薄古，古为今用”等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此前，翦伯赞教授发表了《关于打破王朝体系问题》、《目前历史教学中的几个问题》等文章，对历史教学和教材编写中“左”的思想提出了批评。会上，杨向奎、熊德基等教授，赞同翦老的观点，有不少精彩的发言。

这次教材会议和教材编写工作，给我很大启发和帮助，主要是提高了对历史问题的认识和写作水平。概括起来有这样几点：

1. 朝代是客观存在

打破王朝体系不是不讲朝代的兴亡更替，更不是不许用皇帝纪年。要看站在什么立场，用什么观点来讲，立场观点正确，能够正确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就可以起到“以史为鉴”的作用。朝代和皇帝纪年是客观存在，不用这些，改用公元纪年，反倒带来麻烦，连看古代史籍文献都发生困难。

2. 厚今薄古，古为今用，不能形式主义绝对化

古与今是相通的，是辩证的统一，鉴古可以知今，不是古越薄越好，要掌握适当的比例，要看学习的对象，关键是要明确学史的目的。学习历史，增长智慧，自强不息，振兴中华。

3. 史与论应当有机结合

历史教学既不要“以论带史”，也不要“堆砌史料”、“史料即史学”。要作到史与论、观点与材料的统一。以前讲平型关大捷和百团大战，只从中共敌后根据地一个方面去讲取得的重大胜利，而忽略从整个抗战全局中去分析认识战役的地位和作用，这就是认识的片面性。

在文字上，得到朱仲玉等老师不少帮助。朱老师是缅甸归

侨，以前编辑过报刊，文字功底好。我写的章节经他指点，把长句子改短，把可有可无的字删掉，就显得简洁清爽了。

我在编写教材的同时，仍在学校担任高三文科班的历史课。由于工作任务繁重，再加上三年经济困难的来临，身体渐渐不能支撑，1961年夏，终于病倒住院。

（五）延安洗礼

这次病得很严重，大咯血不止，送到医院抢救，经手术治疗，又转入温泉医院疗养，差不多两年才出院。1963年回校，高中没有了历史课，我改教政治课，不久又担任了行政领导工作。这时，随着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深入开展，在文化思想界也展开了大批判。历史领域批判李秀成，批判“让步政策”，批判“清官”，“左”的思潮日益严重。特别是1965年11月，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的发表，成了“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北京市委和“三家村”成了批判的重点。我这个既是学校领导干部，又因编写教材和“三家村”沾边的人，很快成为众矢之的。经过“清队、整党和斗批改”之后，我被发往延安“锻炼”。

延安是革命圣地，也是我早已仰慕的地方。1970年春，我和几百名北京干部一起到延安插队。我们经长途汽车一整天的翻山越岭，终于来到宝塔山下。当我们望见宝塔山的时候，心情无比激动，忘掉了一天的疲劳，情不自禁地唱起了《延安颂》。我们在延安参观了凤凰山、王家坪、杨家岭、枣园等革命遗址和革命历史纪念馆，以前学过的有关党史的知识，在这里得到印证，感到特别亲切。我参观了抗日军政大学、延安鲁迅艺术学院等旧址，对当年广大白区革命青年，不怕艰险，冲

破重重阻力，来到延安追求真理的动人事迹无比敬佩。在杨家岭中央大礼堂中共七大会址，在毛主席和白求恩谈话的地方，在悼念张思德牺牲的讲演台前……在这些地方回忆革命历史，追思先烈的事迹，使我无比感奋，我的精神境界得到净化和升华。

我被分配到安塞县真武洞公社真郊大队白坪村带领北京插队的知识青年。白坪离县城 5 里，是 1947 年延安保育学校撤出延安后的驻地。这里有北京 65 中高中知青 20 多人。他们劳动生活的条件极端艰苦，思想情绪波动。我的任务是组织他们学习，帮助他们解决一些实际困难，稳定情绪，安心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我组织他们到远离县城的深山老林，去凭吊张思德烧炭牺牲的窑洞，访问参加过延安整风运动的老红军干部和 1942 年大生产运动中的劳动模范杨步浩，和他们座谈，这些活动给我们很大的教育。杨步浩老汉在当年大生产运动中不但自己劳动出色，还主动提出为毛主席代耕（按规定每个人都有劳动定额），并超额完成了生产任务。1944 年春节，杨步浩和延安 18 乡的乡亲们给毛主席拜年，扭秧歌，送金匾，上书《人民救星》四个大字。他和毛主席一家结下了深情厚谊。1961 年国家困难时，他听说毛主席不吃肉同人民共患难，心里非常惦念，又背上小米和红枣，来北京看望毛主席。这种领袖和人民心连心的动人情景，使我永生难忘。

陕北地区自然条件很差，荒山秃岭，千沟万壑，干旱少雨，粮食产量很低。解放 20 多年了，人民的生活依然十分困苦。我住的白坪村有几十户人家，畜力很少，劳动工具还是当年大生产运动开荒的老镢头。每天刚蒙蒙亮，男劳力就背着老镢头和一根绳上山了（背粮背柴全靠一根绳）。中午，妇女担

着粗瓦罐往山里送饭，直到太阳落山才收工回家。一般人家中午吃米饭（土话），加上家里腌的黄萝卜，晚上就半干半稀杂以野菜了。我轮流在各户吃派饭，遇上困难户只能以半碗玉米粒或几个洋芋（土豆）充饥了。插队知青自己起伙，吃得稍好一些。虽生活艰苦，但人民对毛主席和党中央怀有深厚的感情。中年以上的人常谈起当年毛主席转战陕北的动人故事。他们说蟠龙镇大捷后的祝捷庆功会就是在安塞县城开的，因为躲避敌机轰炸，直到黄昏后才开会，周恩来总理到会讲了话。

农村插队生活有些空闲，给我提供了读书的好机会。我啃了几本马列主义的经典著作，有《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等。虽然不能完全读懂，但真刻苦攻读、认真思考，对哲学和唯物史观的一些基本理论问题，还是有了较深入的理解。我给知青和当地干部结合实际讲过一些学习体会。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我给安塞干部群众宣讲过中共中央批判林彪集团罪行的文件，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在当地群众中引起了轰动。

延安三年的插队生活，使我比较地了解了农村和农民，了解了中国社会和国情。我认识到还是毛主席最懂得中国农村的情况，最了解农民。中国民主革命的基本问题是解决农民问题。只有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把马列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才能领导中国民主革命取得胜利。任何脱离实际的洋教条都是无济于事的。我自认为在理论与实践上都提高了一步，更加走向成熟。

（六）老兵新传

1973年我从延安返回北京。我不愿再作学校的行政领导

工作，向领导提出愿教课，搞历史教学工作。东城区教育局根据我的愿望，把我分配到中学教研室，负责全区历史教师的教学和进修。快十年不搞历史教学了，这次重操旧业，一切得从头学起。我在欢迎会上发言，自比新兵，希望得到领导和同事们的帮助。他们回答说：“你不是新兵，是教育战线上的老兵，应当立新功，谱写老兵新传。”

当时，仍处在“文革”时期，“左”的思想严重，抓教学业务工作有一定的风险性，弄不好，又要受到批判。工作从哪里着手呢？我先拜访一些老同事、老教师，经过酝酿，成立了全区历史教师中心备课组，五中王克骏，女二中李青萍，北京中学傅裕文，一百六十五中时宗本等老师都是备课组成员。我们试着抓教学改革，请一百二十四中李榕老师进行一次教改研究课。我们选定了高一年级世界近代史“巴黎公社”这一章，改革的方向是如何让学生学得生动、活泼、主动。李榕老师把这一章当成单元来处理，先由老师精讲有关巴黎公社的重要史实，然后布置指导学生阅读课本和有关巴黎公社的资料、读物、诗歌，在学生讨论体会、心得、收获的基础上，组织一次诗歌朗颂会，用诗歌把巴黎公社的历史比较完整的表现出来。朗颂会由学生主持，进行了将近两节课。整个教学活动，学生积极性很高，学得生动活泼主动，既增长了知识，又锻炼了能力，同时受到革命英雄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教育。这是一次成功的尝试，受到师生的欢迎和好评。

我还利用北京的有利条件，组织教师参观历史文化遗址。我们参观了周口店龙骨山、云居寺石经山、卢沟桥等地。当时，条件比较艰苦，老师们的要求不高，只要借一辆敞篷大汽车或一辆 130 就可以了，用不着花钱。老师们还挺高兴，对教

学有帮助。特别是参观香山健锐营舒成勋老师的住宅，给老师们留下了深刻的记忆。舒老师是我区 27 中的语文老教师，对《红楼梦》很有研究。一次偶然的机，在他住室墙壁的内墙皮上，发现一首梭形诗，经研究和曹雪芹有关。我得知后，就组织教师去参观访问。舒老师带着我们详细察看了香山、卧佛寺一带有关《红楼梦》的文物，讲了不少传说。后来，舒老师的住宅被辟为曹雪芹纪念馆。我再次去看他时，他的日本老伴已去世，显得苍老多了。

东城区教育局负有对口支援平谷县教育的义务。我在局领导的支持下，组织东城区的历史、地理、语文教师到平谷县搞社会调查，编写平谷的乡土历史和地理教材，对学生进行热爱家乡，继承革命传统的教育。我们十几位老师三下平谷，在革命老区鱼子山、南山村、熊耳寨等地，进行了半个多月的调查，与当地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受到了农村生活的锻炼。我们编写的《平谷县革命斗争史》，由内部出版供平谷县和东城区部分下乡的师生使用。

我们最后一次从平谷回城的时候，正赶上全市人民庆祝粉碎“四人帮”大游行。我们欢欣鼓舞，喜气洋洋，此后教学工作出现了新面貌。针对“四人帮”搞影射史学给教师们带来的思想混乱，我联合其他城区在北京历史博物馆礼堂举办历史讲座，请白寿彝等专家和时宗本、陈毓秀等优秀教师讲课，拨乱反正，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我又与北京教育学院合作，第一个办起了历史教师大专班，比较系统地提高教师的历史专业水平。在这些进修活动中，时宗本老师发挥了特长，作出了贡献。我特请时老师作了一次全市性的历史观摩课，讲的是“欧洲资本主义的萌芽和新航路的开辟”，有首都高师院校、各区

教研员和历史教师 200 多人参加。这节课发挥了时老师的特长、讲出了他的特色，在全市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我以《介绍一节历史观摩课》为题，写了一篇文章，发表在《历史教学》1979 年第 6 期上。时宗本老师也于 1979 年被评为全市唯一的历史特级教师。

（七）总结经验

1979 年新学年开始后，北京市教育局韩作黎局长要求总结优秀老教师的教学经验。他说老教师的教学经验是他们一生心血的结晶，千金难买，我们如不及时总结，后悔莫及。他讲了这样一件事：北京四中化学老师刘景昆，教学经验丰富，教学思想异常精邃，受到师生普遍的欢迎和称赞。“文化大革命”前，北京教师进修学院已经派人去总结，系统地进行讲课录音，准备整理出书。可是这些资料在十年动乱中被毁掉了。刘景昆老师也因病去世，成了无可挽回的损失。他希望大家赶快动手，抢救老教师的宝贵经验。

我分析了东城区老教师的情况，认为要抢救经验，先应总结东直门中学（原女二中）宋毓真老师的经验。宋老师已年过古稀，是 1945 年燕京大学历史系的研究生，毕业后一直从事中学历史教学工作，已有近 40 年的教龄。建国初期她就是全市有名的教师，苏联专家普希金到校听课，给以很高的评价。

《历史教学》介绍过她的讲课经验。对象确定了，怎样进行工作呢？我首先组织了一个三结合的总结工作小组，由高师院校的专家、女二中历史组和东城教育分院历史组的老师参加。高师院校的专家是专门研究教学理论和历史教学法的，他们参加指导能使经验得到升华。女二中历史组熟悉宋老师的教学情